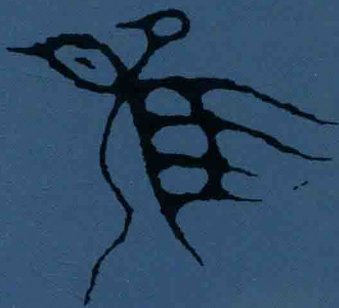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鲁迅与20世纪中国 国民信仰建构



谭桂林 杨 姿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鲁迅与20世纪中国 国民信仰建构



谭桂林 杨姿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民信仰建构 / 谭桂林, 杨姿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3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500-2719-0

I. ①鲁… II. ①谭… ②杨…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
②信仰 - 研究 - 中国 - 20世纪 IV. ①I210.97②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6114号

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民信仰建构

LUXUN YU 20 SHIJI ZHONGGUO GUOMIN XINYANG JIANGOU

谭桂林 杨姿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策 划	毛军英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4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6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719-0
定 价	5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11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存中去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代序

谭桂林

鲁迅学在中国学界是一门显学，鲁迅与20世纪中国之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都是一个持续热门的话题。成果汗牛充栋，意见纷纭杂陈，尤其是近20年来，国内外鲁迅研究趋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现象比较明显。一是大众娱乐化现象。一些文化明星以鲁迅作商品，在各种大众传媒的平台上宣讲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有关鲁迅的言论，消费鲁迅，利用鲁迅，其目的并不是宣传鲁迅，而是以鲁迅的牌号来包装自己，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些江郎才尽的作家则以开涮鲁迅甚至谩骂鲁迅来哗众取宠，迎合后现代文化思潮下社会公众对权威的消解狂欢；一些娱乐媒介甚至把鲁迅与朱安的婚姻、鲁迅兄弟的失和等私人生活事件加以种种的猜测、窥探和渲染，以此娱乐大众。二是价值相对化现象。国内思想文化界有一些学者利用重评20世纪文化论争的平台，或者抬高学术，贬抑启蒙，或者标举胡适，批判鲁迅；不少学者或文化人认为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在时空上是相对的，鲁迅的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意义在于启蒙，在于对旧文化的批判和毁坏，这种批判和毁坏的力量在鲁迅的时代里是必须的，而当下的时代主题是建设，需要的是平和的理性精神，所以鲁迅是过时了的文化英雄，是功能退化乃至错位的文化符号。三是学术的边缘化现象。许多严肃的学者坚守在鲁迅研究领域，但是为了抗衡近20年来鲁迅研究中的浮躁状况，这些严肃的研究越来越学院化、边缘化、琐细化。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成果的突出成就大多集中在研究史的总结、文本技术的解析、资料的整理考据，等等。这三种现象尽管对鲁迅研究的态度、对鲁迅精神的认知截然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倾向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把鲁迅这一民族精神的象征同当下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建构疏离开来。正是针对鲁迅研究中的这三种现象，我们撰写了这一套丛书，目的就在于将鲁迅研究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现实和民族命运重新联系起来。

我们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改革的世纪，政治制度的更迭变换是改革的外在形式，而整个世纪中有关改革的思想则总是围绕着若干基本问题而展开。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型的思想家与社会文化批评家，他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当然是十分密切而深刻的。所以，本丛书以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为线索，提出了八个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的、鲁迅曾经深度介入的基本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清点、整理、发掘和重新解读鲁迅这一民族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与20世纪中国的联系。丛书不仅全面切实地梳理鲁迅研究界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深入地解读阐述鲁迅面对和思考这些基本问题时的思路、资源和观点，而且着重分析了鲁迅这一精神象征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建构与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因缘，深度阐释鲁迅这一文化符号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的能指、所指和功能结构，突出一种从民族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意义上对鲁迅与20世纪中国关系进行综合思考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观念。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思想史角度的采用和综合思考的方法观念，使本丛书既容纳又超越过去从文学史角度或者学术史角度进行鲁迅研究总结的局限性，在新世纪的鲁迅研究中，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思想、文化与现实融会贯通，多种学科交叉融合的鲁迅研究新思维。

在20世纪的中国，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结果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文化思潮；也有不少刚正的知识分子固守民族的文化血脉，主张以儒家文化融汇新知来渐进改良，结果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潮。我们认为，在“五四”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也许只有鲁迅的思想真正超越了激进与保守的思维模式，根基的是本民族的经验和当下的个体生命感受。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用熔铸着民族本土经验和个体生命感受的思想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革与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无可取代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左”倾思潮影响下鲁迅研究的机械政治化倾向，鲁迅研究界曾经发出鲁迅研究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现在30年时间已经过去，针对近年来鲁迅研究的学院化和娱乐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存中去”的口号。所以，本丛书将通过对鲁迅思想的民族化和个体性特点的发掘与阐述，在民族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的基石上，重新建立起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密切联系，让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重新深度介入中国当下社会改革的民族生存现实中去。

基于这样的立场，在本丛书的写作中，我们强调了三个方面的方法理念。

一是突出问题意识。本丛书在研究思路，以思想史为线索，以问题意识为切入口，来清点、整理、发掘和解读鲁迅这一象征和符号在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中的伟大意义、价值及其局限性。这种问题意识的突出，也许能对目前鲁迅研究界纯粹学术研究的学院传统有所突破。本丛书选择的八个问题经过精心选择，其中国民信仰的重建、政治文化的变迁、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等都是我国20世纪精神文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问题，而鲁迅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与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以及鲁迅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上的符号功能与象征意义等，则是本丛书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问题。譬如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子课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国外对鲁迅的学术性研究，也不仅是鲁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我们的重心是鲁迅在20世纪中国对外文化输出方面所起到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及所达到的积极效果。其中包括收集整理和分析西方主流媒体的鲁迅报道、西方主流教育中的鲁迅课程开设情况以及西方主流大学中文系与文学系对鲁迅的学习介绍情况，尤其是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来探讨西方主流教育鲁迅课程开设的特点，为国内鲁迅教育以及国外孔子学院的鲁迅推广提供



参考。正是因为本丛书设计的重心不是单纯研究鲁迅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诸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而是紧紧扣住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着重研究鲁迅这一符号和象征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这一设计方向可能使本丛书的研究另辟蹊径，可以从鲁迅研究浩如烟海而且程度高深、体系庞大的已有成果中突围出来，建构起自己的原创性。

二是强调民族经验。我们认为，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文化批评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他同无数现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改变民族命运而积极介入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而他与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来的一个思想独行者，他从来就是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在“当下”这一时间维度上，以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生存现实的极其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为基础，来考量、思索和辨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所以，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贡献乃是他提供了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民族本土性和生命个体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本丛书在设计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整个课题的论证过程中强调鲁迅思想的民族性，从民族本土经验与个体生命体验相熔铸的观点来阐释鲁迅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界不可取代的独特性。这一观念在鲁迅资源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之关系的研究中具有支撑性的创新意义，同时也能对于国内外近来比较流行的认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想象的历史，民族国家只是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字记叙中的学术观点给予理论上的回应。

三是解读批判精神。我们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化巨人，而他的伟大性在于他是一个思想批判型的文化战士，他的特征是民众的立场、人本的理念、积极介入现实的公共情怀、独立思考的精神原则、不惧于做少数派的英雄气度以及信仰的纯粹意义。这种批判不是只问破坏与摧毁式的批判，而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所倡导的在反思中求证、在扬弃中螺旋上升式的主体自由精神。社会建设需要鲁迅这样的具有纯粹信仰的批判型文化战士来承担社会文化批判的任务，来体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坚作用，



使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建设始终保持一种人本的取向、清醒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对鲁迅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文化建设的伟大价值的阐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丛书的写作力图突出两个方面的特色。一是将历史述评与现实透视结合起来。这一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面的要求,第一是要求每一个子课题都必须有研究史梳理的论证环节,将研究历史的梳理评述与当下研究现状的透视分析结合起来;第二是要求每一个子课题都必须十分重视鲁迅生前与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与20世纪中国民族发展的命运的紧密关系的研究,也即重视鲁迅的生命史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之间的紧密的关联,这是整个丛书研究的历史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也就无法说清楚鲁迅的符号意义与精神象征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民族文明建设上的资源价值所在。二是将社会调查与学理思辨结合:本丛书同时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方面的特质,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项目。因而,本丛书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学理思辨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论证途径。在具体研究中,尤其重视社会调查的环节,合理地设计调查内容,精确地统计与分析调查数据和资料,对鲁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定位、鲁迅资源在某个现实问题中的社会效应、鲁迅形象在国内外媒体传播中的实际状况、鲁迅资源在国内外文学教育中的功能呈现等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由上海同济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在这方面开启了一个先端,但这一项目目前成果侧重在学术与社会物质文化的层面,我们希望本丛书以社会文化问题为中心,将鲁迅的社会影响调查推进到国民精神与心灵现象的层面,从国内影响推进到国际影响的层面,实现在鲁迅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的进一步补充与深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结项成果的基础上编选出版的。2011年底,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获得全国社科规划立项,这对我们既是一种巨大的鼓励,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5年来,仰仗课题组各位同人的大力支持与辛勤劳作,这一重大项目取得了显著成就,各个子课题组成员总共发表出版阶段性研究成果120余项,其中著作6部,论文110余篇,论文集2部。不少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

学》《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课题组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召开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从南京走向世界——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青年学术论坛”，这两次会议得到国内外鲁迅研究专家的热情支持，在鲁迅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项目于2017年上半年顺利结项，作为项目的首席专家，我要特别感谢朱晓进、杨洪承、郑家建、汪卫东、何言宏、刘克敌、林敏洁、李玮等子课题的负责人，感谢参与此项目研究的各位作者，是你们的通力合作和智慧付出，才保证了此项目的圆满完成，也保证了本丛书的顺利出版。在2017年11月绍兴召开的中国鲁迅研究会年会上，新任会长孙郁在感言中说，研究鲁迅是自己一生的坚持。这句话，朴实而掷地有声，可以说代表了我們每个鲁迅爱好者的心声。能够坚持一生，不仅因为我们热爱鲁迅的作品，而且也是因为鲁迅研究是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不仅能够始终仰望着一个伟岸的、给我们以指引和慰安的身影，而且能够经常性地与一些这个时代的优秀的、高境界的心灵进行对话。在这个共同体中，经常能够爆发出给人以思想震撼力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鲁迅研究一代代学人值得骄傲的事情。当然，这套丛书肯定存在许多缺点，我们不敢期待它能有多么杰出的成就，但如果能够为鲁迅研究这一学术共同体提供一点新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与材料，为鲁迅这一民族精神象征重新回到民族现实生存中去起到一点促进的作用，于愿已足。

最后，要诚挚感谢国家出版基金对这套丛书的慷慨资助，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毛军英等领导和编辑们对此丛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付出的辛勤劳动。

目录

绪论 《新青年》的新文化理念与国民信仰建构/1

第一节 “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 / 2

第二节 “信仰共和必非孔教” / 9

第三节 “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 / 15

第四节 “将性命去殉他主义” / 21

第一章 鲁迅的信仰观及其思想理路/26

第一节 “恃智力以辟生路” / 27

第二节 宗教旨在化解“内部生活”的危机 / 30

第三节 信仰非必依赖宗教而立 / 37

第四节 自由、诚实、践履是信仰的根基 / 41

第二章 鲁迅早期信仰的建构与演变/47

第一节 南京时代：走向世界与走向自己 / 47

第二节 选择危机与留日时期的信仰建构 / 63

第三节 历史之“毒”与早期信仰的自我矛盾 / 78

第三章 尼采影响：鲁迅信仰建构的特征与深度/95

第一节 五四思想界的尼采影响 / 95

第二节 “惟向所信是诣”的“心声” / 104

第三节 “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创构 / 113

第四章 鲁迅倒孔：信仰领域中的攻坚战/121

第一节 鲁迅倒孔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聚焦 / 122

第二节 倒孔运动的深层体验与历史感知 / 126

第三节 情感投入、现实针对和坚韧持续 / 132

第五章 后期鲁迅信仰的思想资源与内在整合/140

第一节 三个意象与上海鲁迅的革命实践 / 141

第二节 后期鲁迅信仰中的托洛茨基影响 / 157

第三节 “诗人之死”与后期信仰构成的命运认知 / 187

第六章 国民信仰中鲁迅符号的建构历史/205

第一节 1936—1949：祭文中的“民族魂” / 206

第二节 鲁迅符号在国民信仰中的功能与读解 / 228

第三节 “人”的返回之路 / 246

第七章 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鲁迅资源建设/269

第一节 现代佛教界的鲁迅影响与资源利用 / 270

第二节 基督宗教界的鲁迅印象与资源利用 / 281

第三节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鲁迅资源反思 / 296

第八章 鲁迅信仰问题的世纪论战/313

第一节 从“神像”化到“大话”像 / 313

第二节 “费厄泼赖”的接受命运 / 321

第三节 “拿来主义” 的接受风波 / 326

结语 信仰纯粹性与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337

参考文献/350

后 记/369





绪论 《新青年》的新文化理念与国民信仰建构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曾经的当事人和后来的史学家们都试图赋予它各种各样的意义，而对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出现的种种现象和种种问题，学者们也总是乐意到这个标志性事件中去寻找它们的渊源。这是必然的，因为《青年杂志》的创刊以及稍后几年的运作，确实像一道凌厉的闪电，划开了千百年来中国封建思想伦理铁幕下的黑暗，闪现出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时代曙光。在此之前，陈独秀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有过多年的报刊经历，但那时的办刊目的主要在于宣传革命思想，着眼于民族与民主革命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宪政体制得到确立。但陈独秀痛感当时的中国只有政党政治，没有国民政治，只有政党运动，没有国民运动，所以他这次创办《青年杂志》的目的与宗旨在于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他要在只有政党运动的中国发起一场国民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国民尤其是青年国民的意识中唤起一场伦理的觉醒。在人类进化历史上，文化从来就是与宗教紧密相连，或者说宗教从来就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思想需要资源，当然离不开主义，而伦理的意义根基于价值的评判，伦理的觉悟本质上就是对已有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没有信仰的基点，重估也就无法实施。所以，文化运动也好，思想启蒙运动也好，伦理的觉悟也好，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势必牵连上现代国民的信仰问题。五四时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所破的旧无疑也包括旧的信仰，所提倡建立的新当然也包括新的信仰。五四运动高



潮时新文化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20年代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头十年里，新文化阵营里爆发过不少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如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非基督教运动”、科学与玄学之争等，都多多少少与信仰问题相关，也多多少少能从《新青年》早期的思想启蒙中找到它们的渊源关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具体成果，五四新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如“狂人”）、一些众所瞩目的思想主题（如人生意义的问题探寻）等等，也清晰地体现着《新青年》前驱者们的思想逻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探讨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民信仰的建构关系，也应该从这一历史事件着眼，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准它的意义坐标。这不仅是因为鲁迅后来在钱玄同的劝导下参与了这一杂志的编辑工作，而且是因为鲁迅本身就是在这一杂志上重新开始了他期盼已久的思想启蒙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学创作最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杂志的创刊目的与宗旨。

第一节 “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

1906年，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大谈革命时代革命者的道德时，曾提出他的四个基点：一是知耻，二是重厚，三是耿介，四是必信。前三者来之于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世风》所言，而“必信”则是章太炎自己加上的。他说：“余以为知耻、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谓，而信复周于世用，虽萑苻聚劫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革命的成功需要信，需要主义，需要有信有主义的人敢于舍生取义，但是，“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今之习俗，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是故每立一会，每建一事，未闻其有始卒。”^①所以，章太炎在知耻、重厚、耿介三者之后，再加一必信，对革命家的道德做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论文的演绎逻辑

^①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页。

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民信仰建构

来看，虽然必信是放在最后，但在章太炎的心目中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项。1912年2月，辛亥革命胜利后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到任时发布的关于新教育的意见，其中将教育分为政治之教育与超轶政治之教育二种，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为政治之教育，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其所谓世界观教育的内涵“曰：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①。这里所谓现象世界可以理解为世俗世界，所谓实体世界可以理解为终极价值，所谓世界观的教育就是一种终极价值也即信仰的教育或培植。教育部成立不久，蔡元培又提议将宗教管理事务由内政部移入教育部，理由有二：一是宪法公例，信仰自由，政府不加干预，自然就不必归于内政部管辖；二是宗教为国民精神界之事，本来就占社会教育之一大部分。而我国国民于宗教之观念，尤为朦胧，种种妄诞鄙陋之事，淆杂其间，于宗教之本旨，实相刺谬。所以，“改良内容，别择良楷”，应把宗教事务移归教育部辖理。^②从这种政务安排，也可见蔡元培对信仰与教育关系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不仅对信仰有理论的认识，而且自我躬行、树立榜样，也是辛亥革命时期一帮革命家的人格特点。章太炎三入牢狱，七被追捕，敢于到总统府门前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乌目山僧实践自己的诺言，功成不居，革命胜利后即退隐山林，专心事佛。蔡元培曾盛赞革命先驱者杨笃生“表面虽深自隐秘，而激烈之气，往往于无意中流露”，“先生讲授国文，有关民族主义者，常激昂异常。学生课卷有稍合革命主义者，虽文词草率，辄奖励之；有颂扬君后而抬头书写者，必勒抹而痛斥之。出行则戴大笠，骑驴而观书，意者，先生不忍见北京恶浊之社会故耶”。^③而蔡元培自己也曾奉素食主义，终身不

①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1912年2月11日。

② 蔡元培：《提议以内务部之礼教司移入教育部案》，《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8页。

③ 蔡元培：《杨笃生先生蹈海记》，《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8页。

渝。以上种种可见，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前的一段时期，辛亥革命舆论场域中的领袖人物们已经比较重视国民信仰建构在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重要性，并且用个性鲜明的自我言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形成了重视国民信仰问题的启蒙语境。

可以说，《青年杂志》的创刊也是对这种语境与期待的一种因应。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无疑是对该刊创刊宗旨的阐明。文中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①这段话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政论风格，排比句式凸显出作者的论证气势和重要程度，手足、口舌、心思、温饱、好恶、所信，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指向问题的核心，这个核心问题显然就是“自崇所信”，只有“自崇所信”这一必备条件建立了，才会有所谓“独立自主之人格”。此后，《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不仅有“新”的青年之辨别，而且有“新”青年之愿景与动力。不管是对“新”的青年的要求，还是对“新”青年的启蒙，杂志的编者与撰稿者都对信仰建构问题十分重视。这种重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反面着手，批判中国国民的不良信仰状态。中国人有无宗教信仰，这在学术研究上一直是个争议纷纭的问题。陈独秀曾多次谈到这一问题，而且抱持否定与批判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他的思想革命理念相联系，无疑更促进了他对国民信仰状态的失望。“吾人无宗教信仰心，有之，则做官耳。殆若欧美人之信耶稣日本人之尊天皇为同一之迷信，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奴颜婢膝，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②痛斥中国历代儒生以做官为信仰，这种针砭对于以实用理性为思想本位，以勤王忠君为行为原则的儒家传统而言，真可谓入骨三分。陈独秀在谈到国人“抵抗力”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②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2号。

的薄弱之原因及救济法时，也曾尖锐地指出病因主要在于“学说之为害”与“专制君主之流毒”，学说上“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而“专制君主之流毒”，则使“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①。“学说之为害”说的是供给国人信仰的主义之弊端，“专制君主之流毒”说的是国人“自崇所信”的条件之恶劣，这两者可以说从根基上对国人的信仰状态做了否定性的判断。

清末民初时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新与旧，东与西，处于混杂相糅状态。但在这转型时代，人的面目也常常模糊不清，当年新的弄潮儿很快就成了保皇党，而许多旧事物则偷梁换柱、借尸还魂，以“新”的面目招摇过市。这种状况很有迷惑性，也令一些真正有志改革的先觉者不免气馁。他们认为这都是信仰力不够坚定的表现，所以在《青年杂志》上一些撰稿者特别严厉地批判了这种信仰领域中的中庸气与犬儒气。汪叔潜把国内的改革往往不能进步或者进步缓慢的症结归之于无论新旧都不能“各本其自信”。“吾以为国于天地必有兴立，一国之人，苟有一致之趋向，上也。假使不然，则维新固有维新之精神，守旧亦有守旧之精神，人人各本其自信者，锲而不舍，精神之角斗无时或息，终必有正当解决之一日，惟依违其间，唯唯否否，乃至匿怨而友，阴相残贼，而国家之元气，真乃斫丧尽净矣。”所以，“今日之弊，固在新旧之旗帜未能鲜明，而其原因则在新旧观念与界说未能明了”。^②崇新者遇到阻力往往不能坚持“新”的原则，要么变通，要么妥协，从而使“新”变幻颜色。而守旧者则往往“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于是，“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③这种“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的新

①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3号。

②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③ 鲁迅：《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